

# 略谈日藏宋僧诗集《中兴禅林风月》注释之误

许红霞

## 论文摘要

《中兴禅林风月》一书，是国内已佚而流传于日本的宋代僧人诗歌总集，其传本众多，可分为有注与无注两大类，对研究宋代诗僧及诗歌，具有重要的文献及文学价值。但就其注释而言，也存在着一些错误。本文从文字抄写、引诗作者、诗歌作者生平事迹、诗歌内容等六方面，对其中蓬佐本和龙谷本的注释中出现的错误加以论述辨析，以便我们对此书及其注释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并引起读者注意。

关键词：《中兴禅林风月》 蓬佐本 龙谷本 注释 错误

《中兴禅林风月》三卷，南宋孔汝霖編集、萧澥校正。此书国内久佚，而在日本却有抄本、刻本等多种传本存世。书中共收录宋代六十三位诗僧的七绝、五绝一百首，其中大部分是南宋诗僧的诗作，也有一些北宋诗僧的诗歌作品。这些诗僧及诗歌，有不少是《全宋诗》中所未收录的，对研究宋代诗僧及诗歌，具有重要的文献及文学价值。

关于《中兴禅林风月》一书，近年来已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首先是《文献》2004年10月第四期刊载了张如安、傅璇琮二位先生的文章，题为“日藏稀见汉籍《中兴禅林风月集》及其文献价值”，其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三辑（2007年）刊载了卞东波先生的文章，题为“《中兴禅林风月集》考论”，<sup>1</sup>这两篇文章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此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中兴禅林风月》一书现存日本各公、私图书馆的传本众多，有抄本，也有刻本，有注释本，也有无注本，情况非常复杂。各本的情况及有注本注释之内容、特点、所存在的问题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笔者在日本访书期间查阅了《中兴禅林风月》一书的八个不同版本，并对这八个版本进行了比勘和研究，发现其有注本之注释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和错误，而目前研究者则少有涉及。笔者以为我们在充分认识此书的文学、文献史料价值的同时，对其问题和错误也有必要加以揭示和探讨，以便对此书及其注释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也使读者有所警觉，避免为其错误所误导。

根据作者目前所见，此书共有八个版本（日文抄物资料除外），可分为无注与有注两类。无注本有三个，即日本内阁文库藏江户写本、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平松文库藏写本、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江户时代末期写本。有注本有五个，即日本成篁堂文库藏室町时期抄本（简称室町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明治三十七年简川方外寄赠抄本（简称简川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藏宽永十七年（1640，明崇祯十三年）敦贺屋久兵卫刊本（简称宽永本）、日本名古屋市蓬佐文库所藏文禄五年（即庆长元年，1596，明万历二十四年）抄本（简称蓬佐本）、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所藏室町时代写本（简称龙谷本）。注释当为古代有一定中国文化修养的日本人所为。经过比对可以看出，这五种注释本中，室町本、简川本、蓬佐本、宽永本四种虽然也有异文，但总体差别不大，应属同一系统，同一来源。而龙谷本注释与其它四种版本注释虽然亦有相同之处，但亦有很多不同之处，它与其他四种有注本当共有同一祖本，但内容

\* 作者许红霞，现任北大中文系、北大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sup>1</sup> 此文又见于该作者著《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一书第三章“日藏宋僧诗选《中兴禅林风月集》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4月出版。

有所增减和改动。它们在注释的文字和内容方面都出现了不少错误，现以蓬佐本<sup>2</sup>与龙谷本为例，总结归纳如下：

## 一、二本注中皆有大量误字

因为二本皆为抄本，在传抄过程中都产生了大量的误字。蓬佐本如：

善珍《老马》诗注引“后汉起台赋”云：“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经查此句见《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列传·赵壹传》，是赵壹《刺世疾邪赋》中之句。而《施注苏诗》卷五《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诗注引“后汉赵壹赋‘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七同诗注与《施注苏诗》所引相同，故笔者以为此处蓬佐本注释乃从此类苏诗注本转引，在传抄过程中把“后汉赵壹赋”误写为“后汉起台赋”了，因“赵”与“起”、“壹”与“台”字形相近而误。龙谷本未引。

斯植《故宫怀古》诗注引“《前汉·匈奴传》：宽宁元年，汉元帝时，单于入汉宫，自欲和亲求嫁，汉武帝以昭君赐之。”此非《汉书·匈奴传》原文，乃注者叙其大意，但误“宽”为“宽”字，误“元”为“武”字。龙谷本亦引其大意，但无出现误字。蓬佐本所出现的此类错误还有很多，如：“竹”误为“斥”；“士”误为“二”；“书”误为“昼”；“思”误为“恩”；“日”误为“月”；“小”误为“少”；“今”误为“令”；“宇”误为“字”；“如”误为“妬”；“也”误为“巴”；“困”误为“因”；“宫”误为“官”；“颠”误为“愿”；“阵”误为“陈”；“月”误为“目”；“孔”误为“死”；“称”误为“祢”；“袁”误为“表”；“隋”误为“随”；“寄”误为“奇”；“杪”误为“抄”；“蚕”误为“恐”；“钱”误为“钱”；“徽”误为“微”；“晋”误为“普”；“秧”误为“秩”；“北”误为“此”；“售”误为“信”；“角”误为“甬”；“尊”误为“专”；“吟”误为“冷”；“自”误为“月”；“群”误为“郡”；“政”误为“玫”；“致”误为“到”等等。

龙谷本此类错误也不少，如：

保暹《巴江秋夕》诗在“巴水”二字下注云：“《三巴诗》云：‘阆水东南远，形似巴字，因而为此’。”其中“诗”当作“记”，“远”当作“流”。《三巴记》乃蜀汉谯周所作。蓬佐本诗题下注亦引《三巴记》，其中“记”亦误作“诗”。其它如“喙”误为“啄”；“晓”误为“烧”；“弛”误为“池”；“彼此”误作“比彼”；“俚”误为“俚”；“吴越”误为“得越”；“椀”误为“(木+众)”；“必”误为“心”；“醮”误为“樵”；“策”误为“策一录+银”；“传”误为“傅”；“入”误为“人”；“沈”误为“说”；“叟”误为“古”；“髻”误为“髻”；“迷”误为“凶一水+米”；“亚”误为“恶”；“洪”误为“供”；“汴”误为“拜”；“靖”误为“青”；“白云”误为“县”（因竖写抄写时把二字误为一字）；“捆”误为“捆一困+困”字；“样”误为“樣”；“鷓”误为“鷓一是+足”；“诗”误为“时”；“极”误为“拯一丞+燧一火”；“公”误为“云”；“火”误为“大”；“巷”误为“卷”；“水”误为“冰”；“进”误为“逆”等等。可看出二本大都因形近而传抄致误。

## 二、脱落字句、衍字

二本注中除了有大量的误字外，也有不少地方脱落字句、衍字。蓬佐本如：序文“孔汝霖編集之、萧灝校正之”句下注中云“校正者，撰善恶也。又又曰：校，割也。……”可见衍一“又”字。宝昙《岷山图》诗题下注云：“《晋书》曰：羊祜，字叔子，……为襄阳太守，有德政，亦乐<sub>下</sub>山水。……”其中衍一“乐”字。蓬佐本序文中脱落“禅林者何乎？禅者所述之称也。”两句，但在其前的“中兴者何乎？中间起诗家法语也”两句下有

<sup>2</sup> 笔者所用乃大家光信所编《新抄物资料集成》第一卷影印本，清文堂出版株式会社2000年10月30日出版发行。

注文云：“者字当作丛字，称，语称名。”这显然是对所脱落的两句的注释。宗莹《登鸡笼山访六朝诸陵》诗题下注云：“鸡笼山，吴孙皓登游之地也。六朝者，吴、晋、宋、齐、梁、陈各持一州，在虚（空）宝寺，虚（空）宝寺在建业府鸡笼山下，建业号曰金陵矣。天子庙谓之陵，高七尺者；诸侯（谓之墓，高五尺；大夫谓之冢，高三尺；庶人无冢也。）”<sup>3</sup>蓬佐本落掉引文括号中的两个“空”字及“诸侯”二字后的十九字。斯植《古乐府》之二诗后注引《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也，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上曰池，下曰滨，前广后狭，象专（当作尊）卑之次也。（第一为宫），第二合（乃衍字）为商，第三为甬（当为角），第四为微（当为征），第五为羽也。……”<sup>4</sup>蓬佐本落掉了引文括号中的“禁”字及“第一为宫”四字，衍“合”字，还把“尊”、“角”、“征”三字误写为“专”、“甬”、“微”。龙谷本也有不少落字、衍字的情况，如：法渊《蝶》诗末句下注引林和靖诗句“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脱落“合”字。智纲《寄芳庭法师》诗首句“尺书无处托飞鸿”下注引《古乐府》云：“客从东（方）来，馈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眼中有（尺素）书”。其中落掉了“方”字、“尺素”二字，衍“眼”字。海经《子规》诗末句下注引刘后村诗“一声声劝（人）归去，啼血江南几树花”，脱落“人”字。景偁《偶题》诗末句下注引字书云：“音鵲也。春分鸣则众芳生，秋分鸣（则众芳）歇也。”落掉括号中之“则众芳”三字。如广《中秋无月》诗末句下注引江文通《恨赋》，脱落“江”字。永颐《画卷》诗后注引徐灵晖（即徐玘）诗句，脱落“晖”字。赤骥《山中即事》诗后注引坡诗曰“支颐识此（心）”，落掉“心”字。本立《金井》诗后注引坡诗“金井（辘轳）鸣晓瓮”，落掉“辘轳”二字；永隆《崇真观》首句下注引李白诗云：“晋朝平（当作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莓苔生”，其中“羊”字误为“平”；落掉“头”字，“莓苔生”当作“生莓苔”。显万《乘槎图》诗首句“昆仑初不隔悬河”下注引《兴起行经》云：“昆仑山者，（山皆宝）石，周匝有五百窟，窟皆黄金，常有五百罗汉居之。阿耨夺池周围山外，山内平地，何处何峯，有四金兽头，口流出水，各遶一匝，还其四方，投入十一里。泉中有金象台，方一由延，台上有金莲花，以七宝为台。如来将五百罗汉，常以月十五日，于中说戒。”今见《佛说兴起行经序》云：“所谓昆仑山者，则阎浮利地之中心也。山皆宝石，周匝有五百窟，窟皆黄金，常五百罗汉居之。阿耨大泉，外周围山，山内平地，泉处其中。泉岸皆黄金，以四兽头，出水其口。各遶一匝已，还复其方，出投四海。象口所出者，则黄河是也。其泉方各二十五由延，深三厥劣——一厥劣者，七里也。泉中有金台，台方一由延，台上有金莲华，以七宝为茎。如来将五百罗汉，常以月十五日，于中说戒。”<sup>5</sup>二者说法虽略有不同，但可以看出注中所引有脱漏、衍文、误字，如脱漏括号中之“山皆宝”三字；“何处何峯”四字乃衍；“遶”误为“浇”；“金象台”之“象”字乃衍；“以七宝为台”之“台”，当作“茎”等。居简《柳絮》诗“去作青萍漾水涯”句下注：“《月令》：司季春之月，虹体（当作始）见，萍始生也。”“司”字当为衍字。惠峰《琅华洞》诗题下注引“陶潜《桃源记》云：晋太康（当作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从溪径，忽逢桃林夹岸，无复离，菓芳花鲜，落英缤纷。复前行，穿其林，尽水源，得出，有小口，便舍舟从口入。豁然开朗，屋交通，鸡犬相听，黄发垂髻（当作髻），怡然自乐。渔人问之，答曰：避秦乱至此。问汉令（汉字衍，令当作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魏。闻皆叹惋。汉（当作渔）人既出，遂迷其所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此处转引时，由于删节、落掉了很多内容，致使出现逻辑关系混乱，也有很多错字，使人无法卒读。

<sup>3</sup> 引文参阅永本。

<sup>4</sup> 引文参阅永本。

<sup>5</sup>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 三、文字颠倒错乱，影响文意。

这方面的错误，以龙谷本尤为突出。如：法照《桐柏观会仙亭听琴》诗“琴弹流水坐松关”句下注引“《吕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弦复鼓。”其中划线的字当作“不复鼓琴”。智纲《寄芳庭法师》诗末句下注引《传灯录》布袋和尚偈“一钵千家饭，孤身游万里。青目睹人少，问路~~是~~头。”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布袋和尚传中载此偈，“游万里”作“万里游”，“~~是~~”作“白云”，为是。<sup>6</sup>由于龙谷本在引用一些文献资料时，不顾其内容的逻辑关系，随便进行大量的删节、更改，就导致所述故事内容非常混乱，使人无法正确理解其意义。斯植《故宫怀古》诗“铁笛一声千古恨”句下注引“公安国史补”云：“李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吹为笛，坚如石铁。吕遗李，李誉之，吹笛天下第一之也。月夜泛江，吹之。俄有客立于岸下，呼船共载。既至，清笛而其声精壮，岩可裂。暮言未尝见也。”此段记载人物关系混乱，故事情节含混不清。而唐李肇《国史补》卷下云：“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维舟吹之，寥亮逸发，上彻云表。俄有客独立于岸，呼船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壮，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礴，其笛应声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记，疑其蛟龙也。”<sup>7</sup>则人物、故事清晰完整。显万《乘槎图》诗题下龙谷本注引张华《博物志》：“旧注曰：‘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昔年年八月在浮槎去来，人有奇志，俟其来，登槎上，各赍粮，乘之而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屋宇严遂，望宫中织女及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惊问曰：何由至此？某与说来意，共问：‘此是何处？’答曰：‘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因还，后以问君平，君平曰：‘其日月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其年月至，正是蜀客乘槎到天河时也。’”今见晋张华《博物志》卷三原文曰：“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上，多赍粮，乘查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见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sup>8</sup>可见龙谷本引文经过删改且有误字，使人无法正确理解文意。绍嵩《题方广僧舍》首句“山势如城绕梵宫”下龙谷本注云：“梵者，此云净土，印度梵言佛也。《义海》云：‘印度，月名，具名实时伽，言曰邦，以此大国形土国，如星中月，彼有五印’云也。”其中所引《义海》云云，不知何意。今检宋释子璇所集《首楞严义疏注经》卷一“一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于灌顶部录出别行”下疏曰：“此别目也。印度，月名，具云印特伽，此云月邦。以此大国形诸小国，如星中月。彼有五印，此当中也。”<sup>9</sup>二者相较，可知龙谷本注中有下划线之字皆误，即“印特”误为“实时”；“月”字误为“曰”；“小”字误为“十”，从而影响到我们对文意的正确理解。

### 四、引诗作者之误

二本注释中引用了大量古代诗人的诗句，但所标有些诗句的作者是错误的。如：

<sup>6</sup>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sup>7</sup> 见明《津逮秘书》本。

<sup>8</sup> 见清《指海》本。

<sup>9</sup>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龙谷本斯植《寒食》诗注引灵一诗“庭前有个长松树，夜半子规来上啼”，实乃唐顾况《山中》诗末两句。<sup>10</sup>师侃《春日吟》诗注引严白诗曰：“终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实乃唐严恽《落花》诗后两句。<sup>11</sup>仲宝《雨中怀人》诗注引“张复之影《秋雨》”诗曰：“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碎思乡万里心。”，实乃北宋张咏《雨夜二首》其二之后两句。<sup>12</sup>行昱《寄隐伦万氏子》诗注引“李白诗云：‘孤舟泛月寻溪转’。又诗云：‘万里苍苍烟水暮’。柳子厚诗云……”，就容易使人误解“万里苍苍烟水暮”为李白诗，但此句实乃唐韩愈《桃源图》诗中句。<sup>13</sup>道潜《临平道中》诗注引韩愈《古意》诗句“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称“韩古意诗曰”，在传抄过程中，当落掉了“愈”字。

蓬佐本海经《子规》诗注引“文廷公”诗云：“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实乃北宋范仲淹《越上闻子规》诗的前两句，<sup>14</sup>误“文正公”为“文廷公”。海经《别故人》诗注引刘禹锡诗曰：“落尽一庭梅”，乃唐李益或戎昱《夜上受降城闻笛》诗末句，见《文苑英华》卷二百十二。<sup>15</sup>又引杜诗“鸣轧江楼角一声”，乃唐杜牧《题齐安城楼》诗首句，<sup>16</sup>而非杜甫诗，蓬佐本在引用杜甫诗时一般简称为“杜诗”。惠嵩《天台道中》诗注引元晖《梨花》诗曰：“冷香消尽晚风吹，脉脉无言对落晖”，乃宋谢逸《梨花已谢戏作二诗伤之》其一诗的前两句。<sup>17</sup>道潜《东园》诗注中引“渊明诗云：‘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云：‘片片梅花随雨落，正知春雪散林梢’。又云：‘芦花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使人误以为以上三联皆为渊明诗。而“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乃道潜《秋江》绝句中的后两句；<sup>18</sup>“片片梅花随雨落，正知春雪散林梢”乃南宋章少隐诗句；<sup>19</sup>“芦花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乃北宋秦观《秋日三首》其一之后两句。<sup>20</sup>而宽永本注中“渊明诗云”前有“追法”二字，可见蓬佐本脱落了此二字而致误。赤骥《钓台》诗注中引“山谷诗云：‘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又云：‘万事无心一钓竿，三公不换此江山。’”这就使人误以为此皆为山谷诗，但后一联实乃南宋戴复古《钓台》诗前两句，见《石屏诗集》卷六。<sup>21</sup>又，昙莹《睡起》诗注引鲁直诗云：“天门如水帐如烟”，今见黄庭坚诗中未有此诗句，苏东坡有“簟纹如水帐如烟”诗句，见《东坡全集》卷十三《南堂五首》其五。<sup>22</sup>疑为苏轼诗。

## 五、对作者生平事迹注释之误

总的来说，对作者生平事迹的注释，龙谷本比较简洁，蓬佐本内容要丰富、详细一些，提供了关于作者各方面的更多信息，如作诗的时间、地点；作者所属佛教宗派；作者的生卒年、著作等等。但蓬佐本在这方面所出现的错误也比较多，龙谷本这方面的错误相对要少一些。如法照《桐柏观会仙亭听琴》诗题下蓬佐本注称“晦岩参济大川于普济寺”，义铎《尝北梨》诗题下蓬佐本注云：“此诗铎避北京之乱至江南时，远被寄北梨，有感作焉”等等，就是十分荒谬而不可信的。法照（1185-1273），字晦岩，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俗姓童。

<sup>10</sup> 见顾况撰《华阳集》卷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11</sup> 见《御定全唐诗》卷五百四十六，“终”作“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12</sup> 见张咏《乖崖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13</sup> 见宋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14</sup> 见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15</sup>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16</sup> 见宋周弼编《三体唐诗》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17</sup> 见《全宋诗》册22卷1307页14851。

<sup>18</sup> 见《参寥子诗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19</sup> 见宋赵蕃《淳熙稿》卷十八《梅落二首》诗后引，“落”作“脱”，“正知”作“浑疑”，“散”作“堕”。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20</sup> 见《淮海集》卷十，“芦花”作“菰蒲”，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21</sup>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22</sup>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年十三，礼圣水蒙庵宣出家，后师北峰宗印、浙翁如琰。年三十三，出住阳淡，历住天台大慈、黄岩圣水、云间延庆、凤山褒亲、四明延庆。有海、顺二人自日本来听讲，请所撰《读教记》，绘其像归国。高丽崔丞相亦致书问佛法大旨，乞《九祖图》。理宗闻其名，勅住下天竺，淳祐三年（1243），迁上天竺。补右街鉴义，特赐佛光法师。进左街僧录，赐金襴袈裟。特旨转左右街都僧录，并兼住集庆寺，书“晦岩”二大字赐之。他多次受到理宗召见，为其讲经说法，并受到宠赐。度宗咸淳六年（1270），再住上天竺寺。咸淳九年八月十五日示寂，享年八十九，僧腊七十四。次年赐谥普通法师，塔曰慈应。事见《续佛祖统纪》卷一、明释广宾撰《上天竺山志》卷三、卷四、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八、民国喻谦《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三等。他著有《读教记》二十卷，今存。他是南宋天台宗名僧，被列为天台宗第二十三祖，其师为北峰宗印，乃天台宗第二十二祖。<sup>23</sup>他亦贯通禅、律，曾师事南岳下第十七世，临济宗浙翁如琰禅师，《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就把其列入浙翁如琰禅师法嗣中，但并未见有其曾师事大川普济禅师（1179-1253）的记载。济大川即大川普济禅师，俗姓张，四明奉化（今属浙江）人。曾历住庆元府妙胜禅院、庆元府宝陀观音禅寺、庆元府岳林大中禅寺、嘉兴府报恩光孝禅寺、庆元府大慈名山教忠报国禅寺、绍兴府兰亭天章十方禅寺、临安府净慈报恩光孝禅寺、临安府景德灵隐禅寺诸寺院，<sup>24</sup>并未有住普济寺的记载，且晦岩法照与大川普济二人都曾师事浙翁如琰禅师并为其法嗣，二人当是师兄弟关系，并非师徒关系，蓬佐本此处记载有误。龙谷本只在“桐柏观”下注：“道士观也。”别无其他内容。而义铎即葛天民，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约与姜夔（1155?—1221?）<sup>25</sup>、赵师秀（1170—1219）<sup>26</sup>、居简（1164-1246）同时，生活时代在南宋，曾居于西湖，活动区域当主要在江浙一带，所谓“避北京之乱至江南”是不可信的。龙谷本诗题下注释无此内容。

又蓬佐本在卷一“道潜”名下注云：“教者僧也。……师后入天台学，遂参得于金山寺之无准和尚矣。”这种说法也是十分错误的。关于道潜一生的主要事迹，宋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七十载云：

道潜，於潜浮溪村人。字参寥，本姓何。幼不茹荤，以童子诵《法华经》度为比丘。于内外典无所不窥，能文章，尤喜为诗。秦少游与之有支许之契。尝有临平绝句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苏轼一见为写而刻诸石。后遇轼于彭城，在座赋诗，援笔立成。轼甚爱之。以书告文同，谓其诗句清绝，与林逋上下，而通于道义，见之令人萧然。轼谪居齐安，道潜不遑二千里相从，留期年，遇移汝海，同游庐山，复归於潜山中，轼有次韵道潜留别诗。轼守钱塘，卜智果精舍居之。入院，分韵赋诗，轼云：‘云崖有浅井，玉醴常半寻。遂名参寥泉，可濯幽人襟。’又为作《参寥泉铭》。轼南迁，道潜欲转海访之，轼以书戒止。当路亦据其诗语，谓有刺讥，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国初，曾肇在翰苑，言其非辜，诏复祝髮。苏辙每称其诗无一点蔬笋气，体制绝似储光羲，非近世诗僧比。崇宁末归老江湖。既示寂，其法孙法颖以其诗集行于世。道潜尝赐号妙总大师。<sup>27</sup>

道潜是宋代著名的诗僧，与苏轼、秦观等人相交游，尤为苏轼所赏识。他当生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sup>28</sup>其卒年未有明确记载，《咸淳临安志》中称其“崇宁末归老江湖”，而陆游《老

<sup>23</sup> 见清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卷七下《附天台教观一宗》。见《卮新纂续藏经》本。

<sup>24</sup> 见《灵隐大川普济禅师语录》，《卮新纂续藏经》本。

<sup>25</sup> 据《全宋诗》册 51 卷 2724 页 32035 小传。

<sup>26</sup> 据《全宋诗》册 54 卷 2841 页 33834 小传。

<sup>27</sup>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28</sup>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七十一《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云：“某与大觉禅师别十九年矣，禅师脱屣当世，云栖海上，谓不复见记，乃尔拳拳邪，抚卷太息。欲一见之，恐不可复得。会与参寥师自庐山之阳而出而东，所至皆禅师旧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复书太虚与辩才题名之后，以遗参寥。太虚今年三十六，参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辩才七十四，禅师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当复相从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

学庵笔记》卷七谓“参寥政和中老矣，亦还俗而死，然不知其故。”<sup>29</sup>可见其卒时约七十余岁。他在佛教宗派法系上属于禅宗的云门宗，是青原下十世、云门宗大觉怀琏（1009—1090）的法嗣。陈师道《送参寥序》一开始就说：“妙总师参寥，大觉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释门之表，士林之秀，而诗苑之英也。……”<sup>30</sup>这短短两句话，可谓言简意赅，把道潜的身份、与苏轼、秦观的关系，及陈师道自己对他的评价都清楚地表达出来了。他又在《寄参寥》诗中咏道：“平生西方愿，摆落区中缘。惟于世外人，相从可忘年。道人赞公徒，相识几生前。早作步兵语，晚参云门禅。……”<sup>31</sup>大觉怀琏，俗姓陈，字器之，漳州（今属福建）人。仁宗皇祐二年（1050）诏住东京十方净因禅院，赐号大觉禅师。晚住浙江四明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四明人为建宸奎阁，藏仁宗所赐诗颂，苏轼为记。哲宗元祐五年（1090）无疾而化，年八十二岁。其禅宗传承法系为：云门文偃—双泉师宽—五祖师戒—泐潭怀澄—大觉怀琏。事见《禅林僧宝传》卷一八、《五灯会元》卷一五、元释觉岸撰《释氏稽古畧》卷四。现存道潜诗歌中，仅有一处提及大觉怀琏，<sup>32</sup>我们主要是通过他人的诗文了解他与大觉怀琏的关系的。除了上引陈师道诗文外，苏轼在其《与大觉禅师琏公二首》其二问到所撰《宸奎阁碑记》是否刊石的情况时，曾有“见参寥说禅师出京日英庙赐手诏……”云云。<sup>33</sup>又前引苏轼《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中也讲到“某与大觉禅师别十九年矣，……欲一见之，恐不可复得。会与参寥师自庐山之阳并出而东，所至皆禅师旧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复书太虚与辩才题名之后，以遗参寥。……此吾五人者，当复相从乎？”而明确提到道潜与大觉怀琏禅师在一起的是秦观，他在写给苏轼的信中说：“参寥在阿育王山琏老处，极得所，比亦有书来，昨云已断吟诗，闻说后来已复破戒矣”。<sup>34</sup>据徐培均先生所作《秦少游年谱长编》卷三，此信写于元丰四年冬十月，寄给在黄州的苏轼。<sup>35</sup>秦观又有《与参寥大师简》，称“昨闻苏就移滁州，然未知实耗，果然，甚易谋见也。盖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辍四明之游，来此偕往，琅琊山水亦不减雪窦、天童之胜。”<sup>36</sup>此简当作于元丰三年秋间，<sup>37</sup>说明此时道潜已在四明。又元刘仁本撰《广元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四禅寮记》云：“浮屠氏四禅寮之设，考诸梵典，未闻攸起。独庐山大觉琏禅师始有作于阿育王山广利寺。……师尝悯其教之日隳，念学徒罔进修之地，作蒙堂于山中。坐其资班，参玄讲道，传宗阐教。所谓果行育德，以先觉觉后觉者。凡在丛林，慕而效之。仍别建寮，设四榻，延九峰韶、佛国白、参寥潜三公者，而自主其一。此阿育王之四禅寮自琏公始，而天下竇方之有蒙堂亦始于育王也。”<sup>38</sup>九峰韶即九峰鉴韶（为青原下十世），佛国白即佛国惟白（为青原下十二世），都是云门宗僧人。<sup>39</sup>《宋智果寺参寥子行录》亦称其“初依本县（即於潜县）三学院出家，得法于大觉琏老”。<sup>40</sup>《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中云门宗大觉怀琏禅师下亦列有“道潜参寥”。由此可见道潜为禅宗云门宗大觉怀琏门下僧人当无疑。但蓬佐本注释中谓其为“教者僧也”、“师后入天台学”。“教”，指禅宗之外的天台、华严等佛教宗派，也就说道潜是禅宗之外的天台宗

---

以一叹也。元丰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书。”据此则大觉怀琏、秦观、道潜、苏轼、辩才元净五人的生年皆可推出。

<sup>29</sup>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30</sup> 见《后山集》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31</sup> 见《后山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32</sup> 见《全宋诗》册16页10763《都僧正慈化大师挽词》其一自注。

<sup>33</sup> 见《东坡全集》卷八十三《尺牋一百一十一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34</sup> 见《淮海集》卷三十《与苏先生简》之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35</sup> 见本书页194。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版。

<sup>36</sup> 见《淮海集》卷三十。

<sup>37</sup> 见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卷二页180案语。

<sup>38</sup> 《羽庭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39</sup> 事迹分见《五灯会元》卷十五、十六。

<sup>40</sup> 见《武林往哲遗着后编》本《参寥集》。

僧人，但注中又谓其“遂参得于金山寺之无准和尚矣”，无准和尚指南宋无准师范禅师（1177-1249），曾先后住持庆元府清凉禅寺、镇江焦山普济禅寺、庆元府雪窦山资圣禅寺、阿育王山广利禅寺，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并未有住持金山寺之记载，“金山“当为”径山“之误，宽永本注文则作“径山”。无准师范禅师为南岳下十九世，禅宗临济宗破庵祖先禅师法嗣。可见注文前后矛盾，既谓道潜为“教者僧”、“入天台学”，又谓其参得于属于禅宗的无准师范禅师。且道潜为北宋人，无准师范禅师是南宋人，道潜要比无准师范早出生一百三十四年，注文的说法不是十分荒唐吗！

又蓬佐本在蕴常名下注称其为“金山寺无用弟子”。按，蕴常，字不轻，号荷屋老人，一号寂光。<sup>41</sup> 吴中僧。<sup>42</sup>通内外典，能诗善书，诗歌清丽，字法坚劲。<sup>43</sup>与南宋文人赵蕃（1143-1229）、杨冠卿（1138-?）、章甫等为诗友。曾住江西庐陵青原山、庆元府瑞岩开善禅寺、天台山万年报恩光孝禅寺<sup>44</sup>。孝宗淳熙年间，住天台山国清寺。<sup>45</sup>他在佛教禅宗法系上，为南岳下第十七世，临济宗大慧宗杲门下东林卍庵道颜禅师（1094-1164）法嗣。蓬佐本注却称其为“金山寺无用弟子”，“无用”，当指释净全（1137-1207），号无用，越州诸暨（今属浙江）人，俗姓翁。甫冠即出家，师事大慧宗杲，传其“累典大刹，最后住四明之天童”，<sup>46</sup>并未见有住金山寺之记载，亦未见有蕴常师事他的记载。而明释居顶《续传灯录》卷三十三、明释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卷一及日僧桂芳全久所撰《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中皆把蕴常列为东林卍庵道颜禅师法嗣。

蓬佐本在有关南宋诗僧道璨的生平事迹的注释中，也是真伪混杂，错误颇多。道璨之名蓬佐本中两次出现，第一次是在卷上《宿道场云峯阁下》诗题后，注云：“字无文，□（笔者按，原字残缺，无法辨识，疑为东字）湖人也。参痴绝、无集、蜜庵，振南浦、西山之英气，追浯溪、逸庵之遗响。少年而侍白鹿先生讲下，后学晦静先生，建笔甚于覆瓶。以参为主，以学为长，历掌无准、痴绝、蜜庵三老之记，晚年患眼，而曾命侍僧执笔，任口作文，自然叶其妙矣。嘉定九年癸卯二月示寂，后来小弟推康者，编遗稿为二十卷，号《无文印藁》。”第二次在《送阳晦静起盱江守》诗题后，名下注云：“字无文，古洪人也。住福州荐福寺，此时所送之诗也。”龙谷本《宿道场云峯阁下》诗题后未署作者名，《送阳晦静赴盱江守》诗题后名下注云：“字无文，古洪（当为洪之误）人。”虽然蓬佐本的注释中有不少错误，但可看出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有所依据的。在对道璨其人进行注释时，蓬佐本注者当参考了当时流传于日本的道璨的著作及其他南宋诗僧的著作。物初大观的《物初剩语》卷十三有《无文印序》云：

……前辈愈远，人才愈不竞，一攻于吟，束大为小口吻，声鸣如候虫，其辛苦得之者不离乎风云月露，所谓春容大篇，寂寥短章，迨箴闻矣，方兴秦无人之叹。于斯时也，吾友璨无文崛起，以参为主，以学为篇，振南浦、西山之英气，追寂音、浯溪之逸响，历掌笑翁、无准、痴绝三老之记，三老咸敬爱之。健笔如建瓴，间以稿曰《无文印》为示，余得而备览之，简而足，繁而整，于理脱洒，于事调鬯，盖假文以明宗，非专文而背宗也。……

道璨（1214—1271），号无文，俗姓陶，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为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之族裔。年少之日即去母从释，理宗绍定六年（1233），从其兄陶叔元游白鹿洞书院，与理学家

<sup>41</sup> 见宋杨冠卿《客亭类稿》卷十一《久客倦游归憩僧坊有怀蓬居梵竺脚寂光常不轻》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42</sup> 见宋何溪汶《竹庄诗话》卷二十一外空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43</sup> 见明释无尽撰《天台山方外志》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sup>44</sup> 见日僧桂芳全久编《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

<sup>45</sup> 见《天台山方外志》卷八。

<sup>46</sup> 见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



汤巾讲席，闻知行大要。后漫游吴越二十余年，历见禅宗诸老，曾掌笑翁妙堪（1177—1248）、无淮师范（1178—1249）、痴绝道冲（1169—1250）三老之记<sup>47</sup>。宝祐二年（1254），初住饶州荐福禅寺，开庆元年（1259），住南康军庐山开先华藏禅寺，景定元年（1260）十月，致开先寺事，寓柳塘。景定五年（1264），再住荐福禅寺，度宗咸淳七年卒，年五十八。为南岳下十八世，育王笑翁妙堪禅师法嗣。其著述今有《柳塘外集》（有二卷、四卷、六卷本）及《无文印》二十卷、《无文道璨禅师语录》一卷传世，《柳塘外集》是道璨诗文的选本，流传较广，国内外皆易见，而《无文印》是道璨的诗文全集，但国内稀见，在日本有宋本、和刻本、写本等多种版本流传。日本五山著名禅僧虎关师炼（1278—1346）于康永元年（1342，元惠宗至正二年）所编撰的《禅仪外文集》中，已收录了道璨的文章十二篇，这些文章皆见于今传《无文印》卷十一至卷十三，而其中有八篇文章为今传《柳塘外集》所未收，这就说明这些文章应是从《无文印》中采录的，也就是说在一三四二年以前，《无文印》当已传入日本。今传《无文印》首有度宗咸淳九年（癸酉）李之极序云：

道以忘言为妙，以有言为赘，其说似矣，而实未也。……东湖无文师方弱冠时，天资颖脱，出语辄惊人。坐白鹿讲席下，师事晦静汤先生，雅见赏异。一再战艺不偶，即弃去，从竺乾氏游，异时诸方丛席号大尊宿者，一见辄器之，必以翰墨相位置，无文自是始不能无文矣。岁滋久，知滋多，应酬滋益多。中年病眩，犹信口命侍僧执笔，以书为语，皆刻厉警特，师不自知其为工否也。辛未二月示寂后，其徒惟康粹遗稿二十卷，请于常所来往之有气力得位者，助而刊之，嘱予为之序。予家番，与师游最后而语最合。于康之请，不复辞。……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语默不论也，多寡不论也。师长于文而自号无文，则世之疑之者，浅之为丈夫矣。癸酉长至日李之极序。<sup>48</sup>

显然蓬佐本注者是看到过《物初剩语》、《无文印》这两部书，特别是参考了物初大观的《无文印序》及李之极序的。以上述物初大观的《无文印序》及李之极序中笔者画线部份内容与蓬佐本注释内容相比照，可看出注释中有很多错误。这些错误或因传抄致误，或因注者并无对道璨生平事迹详加研究，且误读原文而致误。如：“无淮（即无淮师范禅师）”误作“无集”；“笑翁（及笑翁妙堪禅师）”误作“蜜庵”；“浯溪、寂音”指北宋诗僧显万（浯溪人）、惠洪（号寂音尊者），注中误“寂音”作“逸庵”；汤巾，字仲能，号晦静，饶州安仁（今江西余江东北）人。宁宗嘉定七年（1214）进士。授繁昌簿，历制置司幹办官。理宗绍定六年（1233），主白鹿书院教席。<sup>49</sup>注中却把“白鹿先生”、“晦静先生”误作二人；“建瓴”误作“覆瓶”；李之极序中称道璨“辛未二月示寂”，辛未即咸淳七年（1271），注中却误为“嘉定九年癸卯二月示寂”，首先，嘉定九年（1216）为丙子年而非癸卯年，其次，据《无文印》卷十九《知无闻》，称其行年五十有四，老母去年逝去，樗翁今年仙去；又卷四《先妣赠孺人吴氏扩志》载其母卒于度宗咸淳丙寅（二年，1266）正月，则可推知道璨生年为嘉定七年（1214），则嘉定九年时道璨只有三岁，可见注者大误。又“惟康”误作“推康”。在《送阳晦静起盱江守》诗题后蓬佐本注释中也有错误，首先，道璨所住为“饶州荐福寺”而非“福州荐福寺”；其次，此诗亦不是道璨住饶州荐福寺时写给汤巾（晦静）的诗。道璨曾两次住持饶州荐福寺，理宗宝祐二年（1254）六月，初住饶州荐福禅，<sup>50</sup>景定五年（1264）十一月末，鄱阳太守孟之缙举之再住荐福禅寺。<sup>51</sup>而据《无文印》卷三《重修宝华寺记》、卷八《橘林诗集序》、《送清奚翁序》、卷十五《汤太博》等文，淳祐四年（1244），道璨客居临川，其秋，省晦静汤巾

47 见《无文印》卷八《橘林诗集序》、卷十《书赵腾可〈云萍录〉》、物初大观《物初剩语》卷十三《无文印序》。

48 见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宋刻本。

49 事见《全宋诗》册 57 页 35837 小传考证。

50 见《卍新纂续藏经》本《无文道璨禅师语录》及《无文印》卷十五《雪坡姚状元》、《万道州》等文。

51 见《无文印》卷十六《忠斋孟知府》、《卓山陈知府》、《古翁江相公》等文。

先生于盱江，并留郡斋旬月。故汤巾为盱江守当在淳祐四年左右的时间内，而不大可能是在宝祐二年（1254）之后，所以道璨此诗亦绝非作于其住持饶州荐福寺期间。由此可见，虽然蓬佐本对作者的注释提供了更多信息，这些信息也是有所依据的，但其注释错误很多，不能尽信。

又蓬佐本在卷中梦真名下注云：“号觉庵，杭州宣城人也。有《迭嶂楼》见于词矣。”龙谷本注：“号觉庵，宣城人”。蓬佐本注释比龙谷本注释多提供了作者有“迭嶂楼”词的信息，但称梦真为“杭州宣城人”，则误。宣城，南宋时属宁国府，在今安徽省，怎么会是“杭州宣城”呢？可见注者对中国地理知识十分缺乏且信口雌黄。

## 六、对诗歌内容注释之误

二本在对诗歌内容的注释方面，也出现一些错误。蓬佐本对诗歌内容的注释有穿凿附会之处，时联系时事，用“君子”、“小人”、“君”、“臣”等关系来注释诗句，龙谷本虽然也有不少问题，但在这方面无蓬佐本注释那样突出。如：

道潜《江山秋夜》诗：“雨暗沧江晚未晴，井梧翻叶动秋声。楼头夜半风吹断，月在浮云浅处明。”是一首写景的佳作，而在蓬佐本诗注者看来，似乎此诗的每一句都有寓意。其注云：“沧江者，沧浪水，谓四海也。终日雨暗者，言时事之暗，以喻君不明而行逆政。宋末自哲宗至高宗时，天下乱未休也。井边种梧桐者，为避鸩毒鸟。井者，言井水沾物而周徧而应人汲引，即喻君子德泽宽施而沾万民而周矣。梧桐者，良材也，凤凰具五色文章，然不梧桐不栖，不竹实不食，不冷泉不饮矣，即君子德也。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云云。虽然，天下暗昧则君子饥，禄失处，其身憔悴枯槁，犹井边梧（桐）翻叶动秋声也。……楼头指朝廷也。夜半近明，克也。风者，比君之号令。月比君子，浮云比小人。《论语》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也。言因小人王荆公执权柄而君子东坡之辈被谪杭州。又道潜谓自也。君若拂小人盗贼，君子德美明矣。”在此诗的标题下蓬佐本注云：“此诗在杭州作也。自是以下三首思东坡作也。时东坡在杭州，道潜思之，犹赞公之思老杜也。”未知何据。众所周知，苏轼曾两次出任杭州，第一次是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六月，除通判杭州，同年十一月至熙宁七年九月在杭州任，但此时苏轼对道潜之名可能有所耳闻，似还未曾见面。孔凡礼先生就认为道潜初见苏轼的时间，是在神宗元丰元年苏轼守徐州时<sup>52</sup>，《冷斋夜话》所叙，有传闻因素。<sup>53</sup>第二次是在哲宗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除知杭州，七月，到杭州任。期间二人交往密切，留下了许多来往唱酬的诗篇和佳话。东坡两次出任杭州，并非是被贬谪，而王安石早在元祐元年（1086）就已去世，且亦无证据显示此诗是道潜思东坡而作，故蓬佐本注者之说非常荒唐。龙谷本对此诗的注释也有问题，在“井梧”下注云：“比乱世翻掌也。秋声者，无贤者而不贤者多谓桐落金井。魏明帝诗云：‘井也，井梧者。’古诗：‘梧生空井。’杜诗云：‘清秋暮井梧零。’井梧自是始。”“翻叶动秋声”下注：“秋草木摇落而变衰，悲本此也。又潘安仁《秋兴赋》云：‘悲哉，宋玉言曰：悲哉，秋之有气也。’秋声者，欧阳有《秋声赋》也。”注释非常混乱。杜甫《宿府》诗首句为“清秋幕府井梧寒”，《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十二在此诗句下注：“魏明帝诗‘双梧生空井’，诗家用井梧自此始矣。”潘安仁即潘岳，其《秋兴赋》中有云：“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为气，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蓬佐本引与潘岳原文同，可见龙谷本此处引文省略过多，且有误。而在“雨暗沧江晚未晴”句下注：“兴也，沧浪也，言江水。此时道潜被流放时诗也。雨晴（疑当作暗），此时暗谓无明君也。又云雨暗终日暗云。”“月在浮云浅处明”句下注云：

<sup>52</sup>见孔凡礼撰《苏轼年谱》卷十七页406，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sup>53</sup>见孔凡礼撰《苏轼年谱》卷十页214。惠洪《冷斋夜话》卷六载：“吴僧道潜，有标致，尝自姑苏归湖上，经临平，作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东坡赴官钱塘，过而见之，大称赏。已而相寻于西湖，一见如旧。”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张伯伟编校。

“浮云浅，云薄貌。古诗‘月在梧桐缺处明’，比吾身谓也。”可见其虽然没有用“君子”、“小人”这样的词语，但也认为此诗是有寓意的，认为“暗”指“无明君”，浮云浅出透出的月光比喻作者道潜自身。龙谷本注者认为此诗作于道潜被流放时。道潜确曾因被诬陷坐刑归俗，编管兖州。《墨庄漫录》卷一云：

吕温卿为浙漕，既起钱济明狱，又发廖明略事，二人皆废斥。复欲网罗叅寥，未有以中之。会有僧与叅寥有隙，言叅寥度牒冒名。盖叅寥本名昙潜，因子瞻改曰道潜。温卿索牒验之，信然。竟坐刑之，归俗，编管兖州。<sup>54</sup>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七记载，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以吕温卿为提举两浙路常平；六月，任权发遣淮南路转运副使；<sup>55</sup>绍圣三年四月十八日，任权发遣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加秘阁校理。七月二十一日，为直秘阁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使；<sup>56</sup>元符元年（1098）九月，为淮南两浙路察访孙杰弹劾而罢官，元符二年八月卒。<sup>57</sup>。则道潜坐刑归俗编管兖州当在绍圣三年四月至元符元年九月间。但关于其坐刑归俗编管兖州之事，朱弁《续骈馘说》及《咸淳临安志》卷七十都记载是在苏轼南迁之后，“素不快者摭摭诗语，谓有讥刺”，因而得罪反初服。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曾肇（子开）为翰林学士，言其非辜，诏复祝髮，紫方袍、师号如故。道潜在山东兖州三年，后回到吴中。其《次韵聪师见寄》诗云：

三年东鲁贬，闭户实超然。静极通幽眇，神游岂间焉。独全霜后操，未异火中莲。不似沉湘客，徒懷忿与愀。<sup>58</sup>

表达了对三年贬鲁的超然、旷达的态度。但并无证据显示其《江山秋夜》诗是被编管兖州时所作。

道潜《临平道中》诗题下蓬佐本注云：“临平山，在杭州仁和县。道中，谓客路经过之间也。或说曰：道潜与东坡以同罪被谪杭州，途中之景也。……”。根据以上所述，可看出其所谓“道潜与东坡以同罪被谪杭州，途中之景”也是十分荒唐的。诗后注云：“猎猎，犬逐（鱼十犬）貌。比风驱菰蒲不闲貌。言君意轻薄柔弱而随小人言语，犹蒲随风弄轻柔。风者，比君号令也，蒲者，比小人下劣也。君号令不正，则随小人之义，指言王荆公也。欲立，谓欲居位而不任己意也。……言民今欲安居不自由。安民之道者，土著为本，王荆公作青苗税役之法，故民不土著也。……莲花者，不为淤泥污，故以比贤人君子处野逃迹安其身。……”根据惠洪《冷斋夜话》卷六所载，此诗是道潜“自姑苏归湖上，经临平”而作，“东坡赴官钱塘，过而见之，大称赏”，说明此诗所作时间较早，最晚也就是在东坡出任杭州通判时。此时东坡与道潜可能还未谋面，何以“同罪被谪杭州”？且“君”与“小人”之喻，完全是随意穿凿附会。龙谷本在诗题下注引《抄出》曰：“道与东坡次，同时被流时途中景也”，显然也是错误的。“风蒲猎猎弄轻柔”句下注云：“言时君轻柔随小人言，犹蒲随风弄轻柔也。”“欲立蜻蜓”下注：“……欲立者，欲居也，非欲起去。蜻蜓，贤者，又吾身谓也。”“不自由”下注云：“言不佳己意也。此诗参寥趣配所时途中作也，言我身欲闲不安云也。”“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下注：“藕花，比贤人。……”。可见龙谷本注者似乎参考引用了蓬佐本注者的注释内容，只是注释内容较简单，也是信口雌黄。

显万《乘槎图》诗：“昆仑初不隔悬河，逆浪吹槎去若梭。莫信银湾清且浅，料知高处更风波。”蓬佐本注云：“昆仑山比朝廷大臣也。大臣如城郭藩篱也。悬河比朝廷，今君不明而朝廷暗昧，君臣矛盾，故大臣不在朝廷，邈居荒僻之地也。梭，比贤人进欲拔身也。银湾，高处，比朝廷。风波，比逆政峻。言图面虽似浅，定知高处波浪恶也。君子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于不义之禄，故逃野急。”龙谷本注释则无君臣之喻，比较客观。

<sup>54</sup> 见《四部丛刊》三编。

<sup>55</sup> 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二〇之一一。

<sup>56</sup> 以上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三之二〇。

<sup>57</sup> 以上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五百十四。

<sup>58</sup> 见《全宋诗》册16页12704。

师侃《金井》诗：“宁为金井栏，莫为金井索。牵断辘轳声，清泉如泪落”。蓬佐本注云：“金井喻君也。一国有君而育万民，如一家有井而沾万物。栏干喻外臣之为君藩篱者，井索喻内臣之执政权柄者。辘轳，井上之滚动条也，以喻小民辛苦。《左传》昭公曰：‘吾视民如子，思民之辛苦如转辘轳也。’清泉，以喻君恩沾也。升平世百姓辛苦，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则君即致爱情抚育之，或到九一之法而怜之耳。如泪落者，言今君施民稼禄，不施恩泽也，君恩少者如泪滴。已而又言君抚育德泽之沾变成民辛苦愁泪之滴也。民不乐者，因君虐也。”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其中所引《左传》昭公语今未见。龙谷本此作本立诗，注释中只是引唐杜甫诗、古诗、唐卢仝诗、宋王安石诗、苏轼诗等来印证、注释诗中的词语，并无以上蓬佐本所注释内容。蓬佐本注者的这种用“君子”、“小人”、“君”、“臣”等关系解诗的方式，正如卞东波先生所说，可能是受到汉代儒僧解《诗经》及唐五代诗格中以“物象类型”论诗的影响，<sup>59</sup>但这种不顾诗歌作品的写作背景和所要表达的本来意义，认为每句诗都有寓意，并强拉硬扯、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这不仅歪曲了作者的本意，也会误导和贻害读者。

二本在诗歌内容注释方面的错误又如：

宗璠《降虏》诗：“鞞哨兵多金哨稀，怕闻坐夏入秋期。祇今跨马弯弓者，曾是襄淮十岁儿。”蓬佐本对其中的第二句、第四句中的词语的注释都是错误的。蓬佐本注第二句：“坐，罪也，坐夏者，被罪华夏。华夏，京花也。又，自夏被罪而入秋之谓也。”注第四句：“十岁儿者，番人微弱而如儿。”其实“坐夏”，是佛教用语，指僧人在夏季三个月中安居不出，坐禅静修，又称夏安居、雨安居等。这里的“坐夏入秋期”，当指从夏至秋时间的推移。因为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以后，理宗及一些南宋朝臣认为收复故土、建立盖世功业的机会到来，遂出兵河南，却以失败告终，损失惨重，还给蒙古军进攻南宋以借口，此后蒙古多次进攻南宋，侵占南宋的疆土。此诗实际上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即由夏到秋，诗人担心蒙古军会越来越多，而蒙古军中那些跨马弯弓的人，多年前曾是宋朝襄淮之地的十岁孩童啊，现在却充当了蒙古军的士兵来攻打南宋。诗人感叹南宋疆土正在逐步被蒙古军占领，似乎隐隐感到了南宋王朝即将被蒙古军颠覆的厄运。龙谷本此诗第二句下注云：“自夏至秋谓也。亦曰：夏，华也，谓京华也。坐，罪也，被坐夏谓也。又西国军入秋来也。”注中首句与末句除外，其他部份内容明显与蓬佐本相同。第四句下注云：“襄淮二州也，元是大宋之地也。十岁儿，言降虏微弱而如儿也。”对“十岁儿”的注释也大致与蓬佐本相同。

龙谷本法具《江涨桥会仲弥正寺丞》，“江涨桥”下注“处名”，“会仲弥”下注“人名”，“正寺丞”下注：“官名，亦仲姓，弥正，名也”。诗题中“会”乃动词，是“会见、相会”之意，而“仲弥正”是姓“仲”，名或字“弥正”，“寺丞”为官名。故当在“仲弥正”下注“人名”而非把“弥正”二字割裂而注。但最后一句的注释是对的，说明注者参考了其他资料。

智逸《湘中春日》诗第三句“花柳隐然诗态度”下龙谷本注云：“隐然者，花柳繁貌也。态度也，态度形也。”对“态度”二字的注释不清楚。第四句“倩谁说与晚唐人”下注云：“时多诗人言潇湘之佳景，倩谁人语知音之好诗人也。”对“晚唐人”的注释，似乎是“知音之好诗人”，并无把“晚唐体诗人”的特点加以介绍。对比蓬佐本，其注释则优于龙谷本。蓬佐本注云：“隐然，花柳繁貌。言造物之象尽是为诗态度。态度，法度也。晚唐诗人律体多，故言潇湘之佳景也，寒暄花鸟、风月、雪霜、冰水，则晚唐能之。倩谁使闻晚唐之作者，谤晚唐体作者之言也。晚唐往往翻馘言语，彩黛篇章，不过风云雪月、草木山川、闺恨客愁、花情酒兴而已。智逸诗叩之，清风拂拂醒人怀，秀语铮铮耸人耳，便晚唐人一见之，神销口丧，不能措一辞于其间，岂晚唐之眼所能窥乎！……”可见注者对“晚唐人”的注释比较详细，并对智逸诗大加赞扬，而对晚唐体诗则持否定态度。

<sup>59</sup> 见《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页92-93，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

景偲《偶题》诗第三句“楞伽看罢无余事”下龙谷本注云：“楞伽者，于楞伽山大惠菩萨记云也。达磨以证心即授二祖，凡六卷。”此注释颇令人费解，并未明确指出“楞伽”是指《楞伽经》。蓬佐本诗后注云：“楞伽，梵语，此翻种种现。此经于楞伽山，大惠菩萨记之也，达磨以证心即非也。自聪禅师问达观颖和尚曰：‘达磨大师自西天带《楞伽经》四卷来是否？’答曰：‘非也，好事者为之耳。且达磨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有四卷经耶？’聪曰：‘《宝林传》亦如此说。’颖曰：‘编修者不暇详计矣。试为汝详<sup>60</sup>之。夫《楞伽经》三译也，初译四卷，乃宋代天竺三藏求那跋陀之译也；后十卷，元魏时菩提流支之译也。流支与达磨同时，下毒药于达磨者也<sup>61</sup>；后六<sup>62</sup>卷，唐天后代于莫<sup>63</sup>三藏实叉难陀之译也。以此证之，先后虚实可知矣。……’”注者引用了自聪禅师问达观县颖和尚(989-1060)的一段话来注释“楞伽”，此段问答今见南宋晦岩智昭所编辑的《人天眼目》卷五，其中记载了自聪禅师五问达观县颖和尚，此为其中一问，可见此处蓬佐本注释要比龙谷本清晰明了。

## 七、结语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兴禅林风月》及其注释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和文献史料价值，二本在对诗歌及作者的注释方面也各有长短优劣，但其注释无论从文字传抄，还是诗歌作者、诗歌内容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无疑会影响读者对诗歌内容及作者生平事迹等情况的正确理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深入研究，并指出其错误，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此书的日人注释者虽然具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修养，但也有不少缺陷，如对中国古代地理知识较缺乏等，对诗歌作者、诗歌内容的注释，有时也缺乏严谨、深入的考究，常常出现疏漏之误，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并给以客观评价的。

本文已发表于《北大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三辑，北大出版社 2014 年 2 月出版。

<sup>60</sup> 宋释智昭《人天眼目》卷五“详”作“评”，为是。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8 册 NO. 2006.

<sup>61</sup> 《人天眼目》卷五此句作“下药以毒达磨者是也。”

<sup>62</sup> 《人天眼目》卷五“六”作“七”。

<sup>63</sup> 《人天眼目》卷五“莫”作“阩”。